

人文学者丛书·第一辑

唐宋词与传播

TANGSONGCIYUCHUANBO

龙建国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传

人文精神

活跃思想

推动理论创新

ISBN7-80647-735-7



9 787806 477359 >

人文学者丛书(第一辑)

唐宋词与传播

龙建国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宋词与传播/龙建国著.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
(人文学者丛书)

ISBN 7—80647—735—7

I. 唐… II. 龙… III. 学术论著 IV. F713.8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95605 号

人文学者丛书·第一辑

(主编:夏汉宁 叶青;副主编:胡颖峰)

书名:唐宋词与传播

作者:龙建国

出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江西出版大厦)

发行

网址:WWW.BHZWY.COM

经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印刷厂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5.75

字数:15.3 万

版次:2004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丛书总定价:280.00 元 本册定价:18.00 元

ISBN 7—80647—735—7/I·461

邮政编码:330006 电话号码:0791-6894645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词的全称为“曲子词”，是一种音乐文学，是一种与诗显然不同的韵文样式。词与音乐相伴而出，脱离了音乐的“词”就不是完整的词或只能视为“长短句诗”，或可姑且称之为“词余”。

词即燕乐。燕乐本是尊前宴边娱宾遣兴的音乐。它的主体是“胡夷里巷之曲”。因此，词与生俱来就富有娱乐性、通俗性、抒情性和音乐性的艺术特征。

早期的词在尊前宴边传播。创作者是那些风流倜傥的文人，传播者则是那些美貌多情、善解人意的歌妓，正所谓“绮宴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按拍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娇娆之态。”在这样的环境里产生的词不仅在形式上富有香艳感，而且在内容上也以男欢女爱、离别相思为主要题材。这种“花间”、“酒边”之作虽算不上严肃的、高雅的文学，但它是人的真情至性的赤裸暴露，以往表现在诗文中的那种“人格面具”已被完全扯开，显现了人性中最美的东西。词人的个性获得一次自由，精神获得了一次舒展。创作主体真正地潇洒走一回。

爱情虽是一个古老而常青的文学命题，但在中国古代那些汗牛充栋的诗文中，尤其是正统文人笔下，这一题材很少被表现。到了晚唐，封建正统意识的束缚力大为削弱，封建伦理道德已被大肆践踏。在诗坛上，掀起了一股情爱大潮，如李商隐的“无题”诗、韩的“香奁体”、罗虬的《比红儿诗》等。这股情爱大潮为诗坛注入了一种新的气息。词是在这种文学氛围中兴起的，受到了这股情爱大潮的直接影响。后代的诗歌虽没有把情爱大潮推而广之，而词则始终保持着这一文学精神，形成了“艳”的本色。前人虽有“诗庄词媚”、“词为艳科”的评语，但对“媚”与“艳”的内涵诠释不够，甚至鄙视这两个字。“媚”与“艳”都是阴柔美的两种表现形式，而

二者又是同质异体的关系。“艳”是一种静态形式;“媚”是“艳”的动态形式。美女花容月貌可谓之“艳”,一频一笑则称之“媚”。“艳”是指词的艳情与丽句的存在形式。“媚”是指词的艳情的流程和丽句的组合。艳情是五伦之情中最真最美的感情。它超越了血缘关系和功利目的。丽句是一种普遍能够获得美感的语言形式,它能直接刺激读者的审美感官。词将二者统一起来了,构成了自身真挚细腻、深婉、柔媚、香艳等艺术特征,永葆着感人至深、薰陶百代的艺术魅力。

词兴起于城市经济萌芽和发展的文化背景下,进而成为市民阶层娱乐的一种重要方式。饮酒听歌是晚唐五代两宋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因此,词明显具有市民文学的特征。追求精神享受、追求性爱自由、反映市民的情趣、运用市井语言等因素构成了词独特的艺术精神。这种以俗为美的艺术精神在五代已形成,至北宋已光大。后代正统学者对这种艺术精神多有非难,认为词“乐而淫、哀而伤”。而从“文学是人学”的理论来看,这种艺术精神是文学必须具备的精神。

娱乐是人的天性。人生得意,须及时行乐;身处逆境,也要苦中作乐,是中国人的生活特点。娱乐是有原则性的,必须是享受自己所创造的财富,决不是挥霍公共财富和他人的财富。只有身心健康的人才懂得娱乐,才会去追求娱乐。娱乐与精神颓废、心灵空虚的人无缘。

从这点上看,中华民族是一个健康、乐观向上的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遗憾的是,许多中国人尚未看到这一点。词中表现出来的享乐意识正是乐观向上的民族精神的表现,值得肯定和高扬。

性爱自由是人类自由的一个部分。在专制时代里,追求性爱自由是人类追求自由的一种常见的表现形式。它是市民意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市民文学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它具有强烈的

反封建性,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不应贬斥为“倚红偎翠”或“寻花问柳”。文人和市民去青楼寻求红粉知己并非全是放纵的行为,而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制度和“相敬如宾”、“举案齐眉”的家庭组合形式所酿造的畸型产物。世人不堪忍受没有爱情、枯燥冰冷的个人生活和传种接代义务的人性压抑,只有到秦楼楚馆去寻求放松和惬意,寻找心灵抚慰和精神寄托。这种社会现象在词发展的时代里普遍存在,为词提供了一个新的、富有进步意义的题材。

在词中出现的妓女和传播词的妓女一般是以卖艺为职业的女艺人,类似今之女性歌舞演员。她们是词大众传播的媒介。她们靠卖唱谋取生计。观众的多少直接影响她们的经济效益,故须考虑票房价值。她们乐意演唱那些雅俗共赏的词以吸引听众。这正是柳永、周邦彦等词人的作品为歌妓和市民所喜爱的原因之所在。柳永与周邦彦都善于提炼市民生活和市井习语入词,创作源泉十分丰富。因此,文学市场十分广阔,不仅文化修养较高的士大夫文人乐于欣赏,“不知书”的市井细民更为喜好。文学以“创造人类集体无意识精神生活”为目的,以“表现大众意愿”为效果,

要让文学作品为大多数人所理解和接受,就必须做到感情大众化和语言通俗化。这就是文学的价值原则。词遵循了这个原则,故能创造出“凡有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和“贵人、学士、市儇、妓女皆知美成词为可爱”的传播效果。

词是音乐文学,也是软文学。其本体特征是阴柔美,女性意识很明显,优美形态的意象是作品的主要建构材料。豪放、悲壮之作是词的异化形式。有很多人不同意这种说法,故词学史上有“婉约豪放之争”。没有结果和毫无意义的争论是学术界常见的现象,笔者不欲介入。而事实必须说明,无论从数量还是从质量上看,阴柔美的作品在唐宋词中占有绝对的优势,就是苏轼、辛弃疾的词也不乏柔美的风格。这种本体特征是词的“出身”和娱乐功

能决定的。

词的艺术精神经历了一个发生、定型、发展和衰落的过程。晚唐、五代词在时代精神的影响下,开始形成一种与诗文迥然相异的艺术精神,性爱与享乐成为词反复吟唱的内容,“情理合一”的文学原则被打破了;质朴自然的语言已不为词人所欣赏了,绮错艳丽的文学形式走俏于文坛,成为词的极佳“包装”。北宋前期,以“晏欧”为代表的词人基本上是承沿五代词人的创作方向。尤其是“柳七郎风味”的出现,五代词被创造性地发展了,并且很快地、长期地笼罩词坛。苏轼极不满意“柳七郎风味”的俗而真率,赋而艳媚,于是创作豪词以矫正之,他在作了《江城子·密州出猎》之后说:“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成一体”。苏轼不仅没有遏止“柳七郎风味”的蔓延,反而赢得了一个“学士词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的讥评。秦观、周邦彦及姜派词人都是沿着“屯田蹊径”走下去的,并且不断地拓宽了这一蹊径。另外一批以曹组、康与之、张抡为代表的词人完全承继“柳氏家法”,开创了南宋词坛的“柳永时期”。李清照在《词论》中说:“始有柳屯田永者,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确乎不谬。《乐章集》是词史上的一座辉煌的里程碑,它标志着词的艺术精神的定型。南宋后期,由于姜派词人的“趋雅”和辛派末流的“叫嚣”,加上词与音乐的分离,词的本体特征开始失落,艺术精神渐渐枯萎,文学市场不断缩小,词走向了衰败的境地。南宋虽然出现大量的反映时代精神——抗金复国之志的作品,但由于词人们在抒写这一主题时,往往不顾及词的软文学、音乐文学的特点,一味“狂呼叫嚣”,使词名存实亡。李清照、辛弃疾、姜夔等人虽曾创造出形式与内容结合完美(即时代感与词的本体特征有机统一)的作品,如《声声慢》、《摸鱼儿》、《扬州慢》等,由于这类作品对创作的技巧要求很高,大多数词人难以做到。这就导致词只能朝两个方向发展,要么保持本色,远离时代;要么干预现实,抛弃本体特征。无论朝哪个方向发展,词都避免不

了衰落的命运。

歌妓是词的重要传播媒介。在唐宋词的发展过程中起到推动作用。她们积极参与了词的创作活动,将词推向了社会、推向了市场、推向了受众。

唐宋词的传播方式是多样的,传播渠道是畅通的。大众传播是词的重要传播方式。这一传播方式是以歌妓和艺人为媒介,通过小唱、嘌唱、鼓子词、大曲、缠令、诸宫调等瓦肆伎艺形式,将审美愉悦信息传播给受众。唐宋词的传播方式还有人际传播、群体传播、文献传播、跨文化传播等。通过这些方式,词得以让当时更多的受众所接受,并成为他们喜闻乐见的艺术样式。

词的辉煌时期虽然很短暂,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长具魅力的一页,对后代的文学、歌词创作都产生很大影响,并且有借鉴作用。词虽然衰落了,但它的艺术精神遗传在元曲和明清小说之中,永远闪烁着不朽的光辉。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社会文化生活的变迁与词的兴起	1
第一节 词是传统文化精神裂变的产物	2
第二节 词是传统审美倾向嬗变的产物	7
第二章 情理冲突的艺术精神	11
第一节 情理合一的传统艺术精神	11
第二节 享乐意识的强烈表现	13
第三节 爱情意识的再度觉醒	16
第四节 人类心灵历程的真实展示	20
第三章 重柔轻刚的艺术追求	24
第一节 阳刚与阴柔	24
第二节 深层细腻的内心观照	29
第三节 纤丽优美的审美意象	33
第四节 娇女步春的艺术形式	35
第五节 关于婉约豪放之争	38
第四章 以俗为美的艺术风貌	42
第一节 词在文学发展进程中的位置	42
第二节 以俗为美的艺术表征	45
第三节 以俗为美的文学价值	51
第五章 音乐文学的优势	56
第一节 音乐与词的起源	56
第二节 燕乐的艺术特征	60

第三节 词的音乐文学功能	65
第四节 关于词乐的几个问题	69
第六章 传统词学理论	78
第一节 铺叙	78
第二节 清空与质实	82
第三节 寄托	87
第四节 重、拙、大	91
第五节 境界说	95
第七章 词衰落的原因	101
第一节 艺术精神的萎缩	101
第二节 音乐美的丧失	105
第三节 传播渠道的滞塞	108
第八章 唐宋词的传播媒介——歌妓	112
第一节 唐宋歌妓制度	112
第二节 唐宋歌妓的种类	115
第三节 歌妓与词人的创作	121
第九章 唐、五代曲子词的传播	125
第一节 唐五代词的传播方式	125
第二节 民间与教坊的双向传播	128
第三节 词体在传播中形成	130
第十章 宋代瓦肆伎艺与宋词的传播	134
第一节 小唱、嘌唱、缠令与词的传播	134
第二节 鼓子词、大曲、说话与词的传播	141
第三节 诸宫调的兴起与词的传播	146
第十一章 唐宋词的其他传播方式	153
第一节 题壁传播	153
第二节 群体传播	156
第三节 跨文化传播	169

第一章 社会文化 生活的变迁与词的兴起

“词者诗余也”这一判断语在历代词话中俯拾即是。在那些抱有传统成见的士大夫文人眼里,词只不过是诗之余绪,是一种有乖风雅,失去了中正和平之音的“绮辞淫声”。如清代田同之所说:“词虽名诗余,然去雅颂甚远。拟于国风,庶几近之。然《二南》之诗,虽多属闺帷,其词正,其音和,又非词家之所及。盖诗余之作,其变风之遗乎?”如果从正统文学观的角度来看,田同之的话不失为有“见”之论。词确实是一种远离雅颂,近乎“桑间”、“濮上”的新兴文体。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词这种兴起于“花间”、“尊前”的“佐乐道”,居然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地形成蔚然之势,进而发展成为一代代表性文学。其内在的必然性何在?似乎很少有人进行深入的探讨。窃以为,这是由于词自身具有一种超乎诗文的艺术优势,即独特的艺术精神。统观唐宋词,我们不难发现,其艺术精神主要表现为,情理冲突的美学风貌,重柔轻刚的艺术追求,以俗为美的审美指归,以及音乐文学的优势。这些因素构成一种推动词从侑饮佐欢之“小技”发展为与诗文并驾齐驱之文学样式的内驱力。又由于词的艺术精神与传统的艺术精神相扞格违悖,导致了词走进一个独特的、全新的艺术天地。这个艺术天地的出现,截割了古代正统文学——诗文正常延续的路线,改变了中国文学史发展的方向。从此,以诗文为主体的文学发展格局被打破,文学史发生了由雅(士大夫文学)而俗(大众化文学)的转变。词为何具有这种充满破坏力和创造力的艺术精神呢?笔者拟将这个问题置于词兴起的时代氛围(即晚唐五代的文化精神和审美倾

向)中来进行讨论。

第一节 词是传统文化精神裂变的产物

自“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由盛而衰,整个封建社会也开始倾斜。到了晚唐五代时期,汉民族已陷入了内忧外患,甚至豆剖瓜分,干戈四起的混乱局面。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正统意识也随之失去了以往的统辖力、束缚力,各种异端思想乘势兴起,人的意识呈现出自由化的状态,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和价值观遭到了严重的践踏,已破碎不堪,因而导致了传统文化心理结构的松弛、散落和民族文化精神的裂变。词的艺术精神就是这种裂变了的文化精神的折光反映。

封建伦理关系的破败是文化精神裂变的一个重要表现。

在中国礼文化中,儒家的“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的五伦关系处于轴心位置,而君臣关系又是五伦的核心。“忠”的意识成了传统文化精神中最为凸现的一部分,它不仅是古代士大夫乃到平民百姓恪守的礼教训条,而且已深深积淀在民族集体无意识之中。到了中、晚唐,“忠”的意识开始弱化。自唐顺宗之后,至高无上的皇帝大多都是由宦官任意摆布和废立,甚至弑杀,皇权的神圣性为人们所怀疑。激进的文人在抨击时弊时,动辄将矛头直指封建君王。如皮日休的《读司马法》,大胆地揭露了自汉魏以来的最高统治者以残害民命来实现其争权夺利之野心的罪恶行径,一针见血地指出:“今之取天下也以民命”。陆龟蒙在《野庙碑》中也借题发挥,旁敲侧击,对腐败残忍的统治者进行无情的抨击和辛辣的讽刺。那些自诩为救民于涂炭的“英雄”,其本质与强盗无异。又如罗邺的《捕鱼谣》直接批判了残害人民的罪魁祸首——天子:“天子好征战,百姓不种桑;天子好年少,无人荐冯唐;天子好美

女,夫妇不成双”。这种强烈反皇权的思想可谓是空前的。到了五代时期,“忠”的意识已是扫地殆尽,叛国弑君,卖主求荣成了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君臣之间的伦常关系已完全被打破。如后晋成德节度使安重荣所说:“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尔!”此语确实道破了当时人们对皇权的普遍认识:君权并非神授,谁兵强马壮,谁能夺得天下,谁就是真命天子。因此,尽管五代时期政权变更频繁,而忠臣义士则屈指可数。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曾为此感慨不已:

呜呼,甚哉!自开平讫于显德,终始五十三年,而天下五代。士之不幸而生其时,欲全其节而不二者固鲜矣。于此之时责士以死与必去,则天下为无士矣。然其习俗遂以苟生不去为当然。至于儒者以仁义忠信为学,享人之禄,任人之国者,不顾其存亡,皆恬然以苟生为得。非徒不可愧,而反以其得为荣者,可胜数哉?②

可见,当时的封建士大夫普遍已无仁义忠信之心,“皆恬然以苟生为得”,不以自己的变节不忠为耻,反以能成为二臣、苟且偷生为荣。世俗也把“苟生不去”视为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事。这种反常的现象在诗文中也常可以看到,如“花间”词人牛希济在由前蜀降唐后不久所作的《奉诏赋蜀主降唐诗》:“满城文武欲朝天,不觉邻师犯塞烟。唐主再悬新日月,蜀王难保旧山川。非干将相扶持拙,自是君臣数尽年。古往今来亦如此,几曾欢笑几潸然”。他把前蜀亡国的原因归咎为“君臣数尽年”,而把将相大臣的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对自己更事新朝,成为二臣丝毫不感到负疚和羞愧,反而说成是“古往今来亦如此”,表现出令人难以理解的恬然自得。象牛希济这样的士大夫在当时多得难以胜数,故欧阳修也不得不予以迁就:“于此之时,责士以死与必去,则天下为无士矣。”可想而知,伦理观念和“忠”的意识在当时士人的心目中已不复存在了。

文化精神的裂变还表现在道德观念的沦丧和人的价值观念的更变。

晚唐五代是封建社会的衰世。政治黑暗,社会动乱是这个历史时期的总特点。但由于南方一些地区(如西蜀与南唐,这是早期词兴起和发展的两块沃土)的相对安定,经济也有所发展,尤其是城市商业经济相当繁荣。又由于经济重心的南移,唐代后期的南方出现了许多商业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其中以扬州和益州(成都)较为著名,成为东西两个商业中心。据《旧唐书》记载:“扬州与成都号为天下繁侈,故称扬益。”当时谚语也有“扬一益二”之美称。足见当时的扬州和成都是十分富庶和繁华的。

由于商业经济的畸型发展,都市意识也迅速地滋长和蔓延。都市意识是一种新兴的、与传统意识相迳违的“浇薄”之风。它的吹起,导致了人心不古,礼乐崩坏。传统的道德观念被人弃之一旁,封建礼教的束缚力大为削弱,各种“非礼”现象方兴未艾。其一,追求享乐成了普遍的社会风气。先看成都:“是时蜀中百姓富庶,夹江皆创亭榭游赏之处。都人士女倾城游玩,珠翠绮罗,名花异香,馥郁森列。(孟)昶御龙舟观水嬉,上下十里,人望之如神仙之境。”③好一幅“君民同乐”图!再看南唐都城金陵:“满眼笙歌满眼花,满楼珠翠胜吴娃。因知海上神仙窟,只似人间富贵家”。(韦庄《陪金陵府相中堂夜宴》诗)其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淫乐”情形与西蜀都城成都相比,毫无逊色。当时的士大夫文人的生活追求就是“歌、酒与女人。”如蜀主王衍的《醉妆词》云:“者边走,那边走,只是寻花柳。那边走,者边走,莫厌金杯酒。”这种享乐纵欲行为与儒家的禁欲思想是相抵忤的,违背了传统的道德观念。其二,传统节烈观的转变和爱情意识的觉醒成了当时世俗生活的一个突出特点。如五代孙光宪的《北梦琐言》卷四所记载:

浙西周宝侍中博陵崔夫人,乃乾符中时相之姊妹也。

少为道士,或云寡而霞帔,自幽独焉。大貂素以豪侠闻,

知崔有容色，乃逾墙而窃之，宗族亦莫知其存没。尔后周除浙右，其内亦至国号，乃具车马偕归崔门，曰：“昔者官职卑下，未敢先言，此际叨尘，亦不相辱。”相国不得已而容之。

所谓“窃之”，实为相诱私奔。私奔者不仅毫无羞愧之色，而且在荣华富贵之后竟高马华盖、扬扬自得地衣锦而归，还说什么“此际叨尘，亦不相辱。”而对这种“违礼失节”行为，堂堂相国不仅不予追究，反而宽容姑息。又如该书卷五记载：

唐裴司徒璩……在番禺时，钟爱一女，选荥阳郑进士以婿之。才过礼期，遽属秋荐，不免随计。无何到京，寻找物故。五教念女及婿，不胜悲痛，而郑偶笑之。盖夫妇之爱未深，不解思虑，非有他故也。大凡士族女郎无再醮之礼。五教念女早寡，不能忘情，乃召门生故吏而告之，因别适人。乱伦再醮，自河东始。

按古代礼制：“男有再娶之礼，女无二嫁之义”，而番禺女子“乱伦再醮”，一再违礼。这种“伤风败俗”之事，不仅没有受到指责，而且还为世俗所效法。可见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道德风尚。其三，由于传统节烈观的败坏，男女自许终身和双双私奔的事也常有发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自由、幸福爱情的追求。爱情意识的觉醒，冲击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婚嫁制度。在唐后期的传奇小说中，为了爱情而不顾一切的“出格”行为每每可见。如杜光庭《虬髯客传》中的红拂，为了得到自己所倾慕的人，不畏权贵，大胆出走。皇甫枚《步飞烟》中的飞烟，为了爱情，不惜舍去生命。裴铏的《传奇》中的裴航，为了赢得自己所倾慕之女子——云英的爱，宁愿为她捣药百日。又如《北梦琐言》卷六记载：“台州盘岫，村有一妇人萧惟香，有才思。未嫁，于所居窗下与进士王玄宴相对，因奔琅琊。”这种把爱情置于至上位置的社会现象是前所未有的。它的出现表明：束缚人们的精神的礼教锁链正在一环环地脱

落,人性和人的自我意识正在不断觉醒。

由于道德观念的变化,引起人的价值观念的更新。在传统的价值观念中,“学而优则仕”是封建士子最大的人生价值取向。十年寒窗苦读,一朝金榜题名,便上可光宗耀祖,中可荣华富贵,下可封妻荫子。因此,蝇营狗苟之徒比比皆是。但到了晚唐五代时期,士人们对生命意义的看法大不相同。他们既不象古君子那样乐于固穷守拙,求仁求义,也不象盛唐志士那样渴望建功立业,留名青史,而是追求舒心适意,放纵自由。我们从“花间”词人的生活履历中便可窥见其一斑:温庭筠“士行尘杂,不修边幅,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与新进少年狂游狎邪。”(《旧唐书·温庭筠传》)韦庄“昔年曾向五陵游,《子夜》歌清月满楼。银烛树前长似昼,露桃花里不知秋。”(韦庄《忆昔》诗)欧阳炯“性坦率,无检操,雅善长笛。”④当时的士大夫文人缺乏一种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普遍沉溺于声色酒乐之中,极力追求精神刺激和心灵快感。通观整个五代史,很少见到功勋彪炳的名臣,也难以找到品行高洁的隐士,而放荡不羁的风流才子则为数不少。当然,成为风流才子和成为名臣、高士都是人生价值的实现,但风流才子是不为传统价值观所认可的,是要被正统文人所唾弃的。因为传统的人生价值取向只有三种:立功、立德、立言,至于经济的价值、科学的价值、艺术的价值等都被置于下下之位,不须去追求。尤其是爱情的价值完全被摒弃于人生价值之外,不允许人们去实现它。而五代人所追求的人生价值主要是艺术的价值和爱情的价值,这无疑是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冲破。

伦常意识的淡化和道德观念、人生价值观念的更替,促使了文化精神的裂变,这是晚唐五代最突出的时代特征之一。兴起于这个时代的词,必然打上时代的烙印,也必然具有一种与传统相悖离的艺术精神。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所说:“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在时代精神的影响